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

□ 童志强

俘、牺牲和失散几个方面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损失情况加以分析，作一考证。

一、突围情况

1941 年 1 月 12 日午夜，被围困在泾县石井坑的新四军余部 2000 余人在军长

叶挺指挥下，开始作死中求生的最后突围。

当时的部署，由第二纵队的新三团、老三团余部集中打正面，军部跟进，教导总队殿后。要求各路在冲出石井坑后独立作战，总的目标是经铜陵、繁昌一带渡江至江北无为地区。那里有孙仲德率领的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和地方党组织接应。

经过重新动员、编组，第二纵队以新三团第二营和第一营为核心，加上军直属短枪队、第一纵队余部共 400 余人组成左路突围部队，从石井坑以西经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由其余散部 800 余人组成右路突围部队，从石井坑西北经凤村向章家渡方向突围，第二纵队首长和军直属右路行动；在周围山坡上没有来得及撤下来的第三纵队剩余部队原地坚持牵制敌人，等军部冲出石井坑后再寻机突围。

午夜 12 时，突围开始。

突围部队集中所有机枪火力打开血路，前仆后继，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仍被敌人分割打散。后在地方党组织的策应下，陆续突围到达江北。

右路突围部队刚突出石井坑阵地前沿就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几十挺机枪封锁，当即伤亡 100 余人。突围部队视死如归，勇猛冲杀，终于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于天亮时冲到章家渡，这时部队已走散不少。在涉青弋江时，又遭埋伏在对岸新七师机枪封锁，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国共局部内战中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究竟有多少？长期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以四本比较权威的党史专著和工具书为例，从中可见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就大相径庭：

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认为，“除傅秋涛率后续部队千余人突围渡江到无为一带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廖盖隆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认为，“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认为，“除约 2000 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

上述四书中，对新四军突围人数有“千余人”、“约两千人”、“2000 余人”几种提法；对突围以外的其余人员，则有“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等几种提法。

本文依据掌握的有关史料，试从突围、被

当场在江中伤亡数十人，队伍只得从江中后撤上岸。此时凤村国民党军已向章家渡方向追来，部队复被分割成几股分散突围。

左路突围部队一鼓作气冲出石井坑，途中与老三团部分指战员会合，连夜冲过茂林，于黎明前从灰沙洲涉过青弋江。部队占领南山岭背后 396 高地，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整天，伤亡较大。后乘夜摆脱敌人，到繁昌狮子山休整，集结部队寻机渡江。

成批的突围部队按突围时间顺序排列先后有以下几股：

第二纵队政委黄火星、军特务团团长刘别生率军直属队、教导总队、新一团、第五团等部被打散的 90 余名指战员经大康王过章家渡，从三里店、峨岭抵繁昌江边，于 1 月 18 日晚从油坊嘴渡江抵达无为白茆洲（黄火星、杨刚回忆）。这是皖南事变中最早突围到江北的一股。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钟德胜、第二纵队供给主任潘友宏、新三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等 10 余人经焦石埠过青弋江，于 1 月 20 日从沙洲过江到无为东乡（熊梦辉、钟德胜、潘友宏、阙中一回忆）。

新三团参谋长张日清率 20 余人从丁家渡过青弋江，经左坑、三里店到长江边，于 1 月 21 日晚过江到无为（张日清回忆）。

新三团第二营营长巫希权、第一营副营长张玉辉率左路突围部队余部从灰沙洲过青弋江，经中村、北贡里、何家湾、水龙山到繁昌狮子山休整数天，收容到近 200 人，于 1 月 25 日晚分乘 2 只大船渡江到无为（张玉辉回忆）。这是皖南事变中突围过江人数最多的一股。

军特务团第一营军事主任蔡园率该营二连 10 余人经戴家汇抵繁昌江边，于 2 月初从泥埠桥渡江抵无为（蔡园回忆）。

第三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军特务团政治委员张闾初、特务团代参谋长杨采蘩、团政

治处组织股长石昂等率特务团和三团部分指战员冲出石井坑后，于 1 月 23 日到铜陵、繁昌一带，部队陆续集中到 200 人左右，于 2 月 5 日起，分 3 批渡江到无为（张闾初回忆）。此事可以从当时在江北无为一带负责收容工作的曾希圣致在皖东的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张云逸转党中央电中得到证实。2 月 12 日，张云逸向中央转曾希圣 2 月 6 日电云：“三支队参谋长黄序周率特务团一部 200 余，轻机枪 4 挺，重机枪 2 挺，步枪 90 余支，驳壳枪 20 支，于上月 23 日到铜繁，5 日晚□□率 60 余人北渡到无为，其余尚在铜繁活动。”

第三纵队军法处长张福标、纵队直属队第五连指导员吴长武在突围中会合纵队通讯参谋沙林等共 20 余人经铜山、水东翟村过青弋江到繁昌边，于 2 月上旬渡江抵无为白茆洲（沙林回忆）。

又据曾希圣、孙仲德致张云逸、邓子恢关于收容情况的电报称，截止 2 月 14 日，“收容到皖南部队共有 578 人，长短枪 356 支，轻机枪 20 支”。这个数字与上述几股突围部队的人数之和大致相当。

此后，仍有部分指战员陆续突围抵江北。

第一纵队新一团在 1 月 11 日球岭失守后，除一部分指战员转移到石井坑，后来参加石井坑突围外，另有数十人在团长张铨秀率领下经铜山、小河口到铜陵县顺安附近的团洲，于 2 月中旬渡江到无为（张铨秀回忆）。

此外大约有 200 多名在突围中被打散的指战员，怀着坚定的信念，三三两两或单身一人设法突围到达江北。

最后一批突围抵无为的新四军指战员有 70 余人，时间为 4 月 10 日。他们原先和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一起隐蔽在泾县石牛坞赤坑山一带。3 月 14 日凌晨，项英、周子昆在赤坑山半山腰的蜜蜂洞内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暗害后，其余人员经与中共皖南特委取得

联系，经茂林、章家渡、北贡里，到繁昌县油坊嘴过江。其中主要干部有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第二纵队参谋长谢忠良、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第一纵队新一团一营营长李元、第三纵队第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谢忠良、李元、陈仁洪、马长炎回忆）。此事因涉及项英被害，事关重大，有文献佐证。李志高、谢忠良在突围抵江北无为曾希圣处后，于4月18日用曾希圣的电台联名致电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职等将项、周尸秘密埋后，并以全力捕捉逃犯，半月有余，竟未得手。乃是续收干部数十，于4月10日最后突围。职等已安抵希圣兄处。”

据曾希圣1960年所作回忆录《皖江的抗日斗争》所载，“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一部分去了苏南，大部分从繁昌、铜陵一带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共约700人”。

曾希圣于皖南事变前被从军部派往江北指挥部工作，因交通阻碍滞留无为，适逢皖南事变发生，他奉命在中共无为县委协助下主持皖南突围人员的收容工作，是当时受命在江北主持收容工作的新四军最高领导人，不久即担任由突围部队和江北部队合编的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他回忆突围到无为的皖南新四军人数“共约700人”无疑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而且确与史实相近。

皖南突围部队除大部分直接向北过江到安徽无为外，也有少数向苏南突围的，这主要是第一纵队的成员。

第一纵队1月9日在枞山激战后与军部失去联络，部队被打散。以后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率10余人经宁国、宣城向东突围，沿途又收容了少数人，于2月上旬渡溧水抵苏南根据地（傅秋涛回忆），而并非如《中国革命史讲义》所述“傅秋涛率后续部队千余人突围渡江到无为”。

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纵队副参

谋长吴咏湘、老一团团长熊应棠、老一团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民、特务营营长饶惠潭等率20多人经广德沿天目山于2月中旬也转移到苏南根据地（江渭清、熊应棠、张祖池回忆）。

此后，也有少数被打散的新四军指战员辗转向东抵达苏南根据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东南局还有以下一些重要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分头经铜繁、屯溪、芜湖、上海等地辗转突围归队。他们是：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李一氓、参谋处长张元寿、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夏征农、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人钱俊瑞、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吴奚如、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军司令部参谋处通讯科长胡立教、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军法处地方科长杨帆、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汪大漠等。

从以上史实统计，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并且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人数最多也只有1000人左右，而不是“约2000人”，更不是“2000余人”。

二、被俘情况

在皖南事变中先后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约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在弹尽粮绝、负伤、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被俘的，叶挺、黄诚、林植夫等则是去谈判时被扣的。此外，据国民党繁昌县长徐羊我、县党部书记洪添铭1941年2月丑元日致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的报告可知，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突出重围后，在南陵县童村乡南保村养伤时，因到江北联络的交通员被捕搜出冯达飞亲笔信而暴露行迹，终被国民党中统南陵调查室特务捕获。

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经过长途递解，于1941年2月被关押到浙江省淳安县开化。2

月17日，经何应钦修改审定，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明令由第三战区负责主持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3月，新四军被俘人员被押送到江西上饶地区，在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以及铅山县石塘等监狱组成的上饶集中营这个特殊的战场，开始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新的斗争。

集中营的对外名称分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和特别训练班两个单位，1942年4月两部合并，改名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被俘新四军高级干部和部门负责人计有：军长叶挺、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第一纵队参谋长赵希仲、第三纵队第五团团长江金树、第五团政委林开凤、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项永章、教导总队干部队长王羲亭、军司令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副官处第三科科长叶钦和、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汪海粟、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萧正冈等人。高级干部被单独囚禁于李村、西山、七峰岩、石底监狱，其余干部被囚于周田、茅家岭。被俘的士兵（其中也有部分未暴露身份的下级军官）被认为“抗战意识比征募之兵员为强”，遂分期分批地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各部队（期间逃出不少）。

国民党顽固派俘获上述新四军高级干部后，如获至宝，采取种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收买他们为其制造反共事变提供有利证据。然而绝大多数新四军被捕干部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军长叶挺拒绝高官引诱，甘愿把牢底坐穿。不少人把国民党的审问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如黄诚在回答审讯人员关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问题时，理直气壮地回答：

“共产主义当然是对的。我是共产党人，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转变我的信仰的，也绝没有人可以说服我。”“目前我没有方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并希望你们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书给我看，让我仔细研究。不过，现阶段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将毛泽东同志的东西驳翻的。”李子芳的口供则是：“我也没有理由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我是共产党人，何况六七年我受的共产主义教育。虽则我了解问题容或不够，但我坚决相信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当然，革命就如大浪淘沙，革命队伍中出现少数败类也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一被捕就屈膝变节，向审讯人员宣称：“我早就想脱离中共而没有机会。”“我今后有两个目的：一是做反共工作，一是愿意报效中央”。他还按敌人意图，编造新四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开火的谎言，引诱第一纵队参谋长赵希仲与其一起叛变。他们两人和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先后在报上刊登反共文章，卖身求荣，充当了可耻的国民党特务。

上饶集中营关押的新四军具体人数，据1941年10月25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电称：“原收容叛军官兵共计3362员名，续收914员名，除逃亡及病死外，现有人数计第一大队1276名，第二大队1247名，军官队657名，军士队276名”。据此计算，“原收容”和“续收”两者相加为4276名，再加上在李村、七峰岩等地被囚禁的叶挺军长及其他干部30多人，被俘总数约为4300余人。

三、牺牲和失散情况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有不少高级干部和部分负责人光荣牺牲。直接牺牲在事变战场上的计有：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是身负重伤、追兵将至、怕连累身边同志而举枪自戕的）、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宁死不屈、

跳崖牺牲)、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胡荣、军政治部秘书科长杨志华、青年科长陈惠、军法处第一科科长雷震、第一纵队新一团参谋长徐赞辉、第二纵队第三团代参谋长杜剑秋、第二纵队青年科长林高峰。此外,著名音乐家、《渔光曲》谱曲者任光中弹牺牲。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时,于3月14日凌晨遭身边的军部副官刘厚总暗杀。

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高级干部,除军长叶挺被长期辗转囚禁(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获释),赵凌波、赵希仲叛变后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外,其余黄诚、李子芳、张正坤、冯达飞、林开凤、萧正风、项永章等因为领导狱中斗争、不甘屈服而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徐金树则是在石底监狱越狱逃跑时在同追捕的宪兵搏斗中牺牲。

此外,有近200名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毒死和遭受长期折磨致死。军部女机要员施奇,在事变中被国民党兽兵轮奸致伤,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后,下体溃烂,备受折磨,但她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宁死不屈,拒不“自新”,最后惨遭活埋。

在一些关于新四军历史的论著中,有两位新四军干部由于以讹传讹,在当时曾被宣传为牺牲的烈士:一个是黄源,鲁迅的学生,著名的文化人士,由于误传其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的好友石西民在重庆著文悼念过他,实际上他在事变中突围后返回新四军,解放后曾被打成右派而沉寂,离休前为浙江省文联主席(现仍健在);另一个是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他被捕后,于1944年获释,但在新四军政治部1943年编印的《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中,他不仅被收录于“本军抗

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中,并注明“1942年5月于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该书“纪念文汇”中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写的《忆王聿先同志》的悼文。其实王聿先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卫生局长,直至离休(现已去世)。

被囚禁的数百名新四军各级干部在监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寻机越狱逃跑。当时,集中营为了蒙蔽社会视听,组织“犯人”成立了篮球队、剧团,表示上饶集中营是一个训练机关,以欺骗舆论。先后有一些同志乘外出演戏、赛球时人多混乱之机逃离虎口。

1942年5月25日下午,囚禁在茅家岭监狱的26位同志在王传馥、李胜等领导下,乘敌不备,夺得轻机枪2挺、手提机枪2挺、步枪8支、手榴弹39枚,越狱暴动成功。除2人因负伤被捕杀外,其余24人胜利冲出牢笼,奔向武夷山。

在茅家岭暴动胜利的鼓舞下,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途中,第6队100多人在王羲亭、陈念棣等领导下,利用渡崇溪河时的有利时机和地形,在闽北崇安县赤石举行赤石暴动。最后有40余人冲上武夷山和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同志会合,一起参加了中共福建地下省委领导的游击队。

综上所述,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指战员9000余人共计突围1000人左右,被俘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有4300余人(其中有近百人突围归队),其余3000余人即为被打散和牺牲者。因此,用“约1000人突围,其余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来说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损失情况,基本合于史实。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根广)